

陶纺见证战国中后期辽西融入燕文化

本报记者 杨东 朱忠鹤

本期导读

彩绘陶纺出土于葫芦岛市建昌县东大杖子村战国墓葬。在已发掘的多个墓葬中,出土这对彩绘陶纺的墓葬是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这对高约73厘米、造型别致的战国时期随葬品,一方面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尊贵,另外一方面,它揭示了战国中后期生活在辽西地区人群的社会生活状态。

文物档案 彩绘陶纺

为仿青铜器的陶器,葫芦岛市建昌县东大杖子战国墓出土。纺是一种方口大肚容器,用以盛酒或粮食,属中原文化青铜器具。这件文物高约73厘米,通体红彩,体现南北文化融合特色。此文物证实,墓主人生活在战国中后期,且是当地的贵族,已经融入燕文化。(辽宁省博物馆藏)



多民族交融的生动例证

朱忠鹤

在辽河流域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有一个词语忽视不得:边疆。在历史文献中,常见“辽东是边疆地区”之类的表述。

这样的表述显然与现代人对辽宁的认知有差异,但历史就是如此,古代史里的辽宁被称为辽东,很多时候的确处于中原政权的边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北大学者口中的“西有敦煌,东有朝阳”之类的表述。

东大杖子战国墓葬群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注脚。就像考古工作者在墓葬中发现的那样,在距今2000年的墓主人随葬品里,既保留着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燕文化元素,也保留着当时辽西原住居民的文化色彩。虽然学者们对墓主人准确身份的界定有分歧,但趋于一致的意见是,这些紧邻燕国的辽西地区原住居民当时已经深受燕文化的影响了。

这既是古代辽宁地区多民族交融的直接例证,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标记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又一个高潮。

历史上,辽宁地区并不缺乏文化交流的例子。长达1500余年的红山文化就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产物,而距今5000多年的牛河梁红山文

化,还反过来开始对位于中原地区的文化产生影响。

再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频繁的、轮番在辽河流域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每一次政权的确立,随之而来的都是主政者试图在文化上的“改朝换代”,然而,新旧文化的交替并不会像主政者期待的那样,前者将后者完全抹杀掉,而是在互相影响中,最终融合在了一起。

不论是历史之辽宁的厚重,还是今日之辽宁的多姿多彩,都源自这种持续不断的民族交融与文化交流。比如,在今天辽宁人的很多方言口语中,就保留着不少满族词语,这些词语在让外地人不知所云的同时,却折射出了曾经地处边疆地区的辽宁在民族文化上的充分交流与融合。

再比如,辽宁的一些地方饮食上,也保留着地域文化的色彩,如冬季里热气腾腾的酸菜炖粉条、小鸡炖蘑菇……这些都是冰天雪地里,长久生活在东北的民族在酷寒中谋求生活幸福的完美搭配。

总之,多民族融合是辽宁历史文化特质之一,我们应该深入挖掘这一文化要素,它会为辽宁对外形象展示、旅游资源包装等带来启迪。

47座战国古墓 出土2000余件文物

“古墓村”,这是群众对葫芦岛市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村的简单概括。群众用最简短的词语将东大杖子村的特点表现出来——这个小山村的确就建在古墓葬群上。几十年前,村民们在盖房挖窖的时候,时常会挖出一些在他们看来稀奇古怪的物件,但那时,谁也没有在意。

20多年前,考古工作者开始对东大杖子村进行探测及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47座,出土2000余件文物。

考古专家推测,整个村子下面深埋着至少200座以上古墓。

成片古墓群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民原本的生活。东大杖子村委会大门口的展示栏里,展示着古墓群和出土文物的图片。在村内已经回填的遗址上,几间平房组成的“东大杖子遗址工作站”已经成立。

除了这些外在的改变,村民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对文物的认知,也因为墓葬群的发现而发生变化。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村里建立了一支党员巡逻队,

队,24小时对村里的文物安全进行巡护;村民们在自家翻盖房屋、打井挖窖之前,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与同意。不仅如此,一张高科技文物保护网也已经在东大杖子村铺开,“保护地下文物安全”成为全村上下的共识。

东大杖子墓葬群也确实值得如此兴师动众的保护——它的年代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前后共延续了200多年。这也就意味着,2000多年前,在东大杖子村所在的这片土地上,有一群人或几群人陆续地埋葬去世的先人。

村子里已经发掘了47座战国墓。2000余件出土文物让考古工作者很是诧异:一方面是因为出土了丰富的文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出土文物所彰显的独特性。

这些文物中,有盖豆、青铜壶等容器,也有玛瑙杯、珠玉串、玉璧等饰物,还有青铜短剑、戈、矛等兵器。在第40号大型墓葬里,更是出土了大量丰富的各式文物,其中包括一对造型别致、风格独特的彩绘陶纺。

中心大墓主人是原住民中的贵族

东大杖子村第40号墓是一座“填土墓”,也就是说,在棺椁入地后,用黄土对棺椁进行填埋,它区别于东大杖子墓葬群中的一些“封石墓”。它是所有已发掘的墓葬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墓圹近方形,南北壁长9米、东西壁长8米左右。丰富的随葬品多数位于内、外椁之间的“头厢”部位,以仿青铜彩绘陶礼器为主。

经统计,这座墓共随葬陶礼器49件、铜器5件、铁器1件、石器3件、玉器14件。棺椁之间还出土了大量的石饰件、陶珠、陶坠等文物。

在众多随葬品中,一对彩绘陶纺较为夺人眼球:它尺寸高大——高度约有73厘米;它造型独特——通体红彩,上面绘有单线卷云纹,壶盖周边斜置八瓣微微盛开的莲花,壶颈处附有两个兽形壶耳。

“这对彩绘陶纺不是实用器,而是明器,也就是随葬品。”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华玉冰当年曾对东大杖子古墓群进行两次考古发掘。作为墓地资料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他这样说。

第40号墓中除了大量的随葬品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头骨,

共计74个个体。

那么,这座墓葬里埋葬的是什么人呢?

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看,这座大墓与燕文化墓葬有较强的一致性,表明其在礼制与文化方面对燕文化存在高度认同。据此可将这座大墓定为燕文化墓葬。

但是,这座大墓中墓主人的头部朝向又与典型燕墓、辽西地区其他的燕文化墓葬截然不同。相反,它与东大杖子墓地其他原住民的墓葬朝向保持一致。

研究发现,当时的燕人墓葬死者头部多向北,或向南,即使后来迁居辽河流域的燕人也无不如此。而已发掘的东大杖子墓葬中,墓主人绝大部分头向东,头向西的是少数。根据此前其他地区出土的墓葬发掘显示,之所以头向东或向西,可能与死者性别有关。另外,这座大墓中大量随葬的牲畜具有北方原住民文化墓葬特点,这一特点在燕文化墓葬中看不到。

由此可以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可能为辽西原住居民。此外,这座大墓随葬有七鼎六簋组合的仿铜陶礼器,是带有单墓道的大型墓葬,可以判断出墓主人具有很高的身份,是贵族。

东大杖子原住居民是谁

那么,这些还没被纳入中原版图的辽西原住居民是一群什么人呢?

根据考古发掘及历史文献资料,华玉冰推测,他们很可能是与当时燕国相邻的貊人,生活在东胡族的东面。

华玉冰表示,“貊”(mò)这个民族曾被周所封的诸侯国管辖,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关系,貊与燕国很亲近,自称貊国。由于距离相近,貊与燕所在地居民关系密切,中原人将他们统称为“燕貊邦”,貊人早期文化落后,常常被中原人蔑视。后来,貊国被燕国所灭。

如果东大杖子墓葬群中的主人是貊人,那么,著名历史事件“秦开却胡”中,燕国大将秦开在辽河流域的一系列行为是在完成“固土”而非“拓疆”,也就是说,他守护的是深受燕文化影响的当地原住居民固有的领土,而不是侵略。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东大杖子战国墓中的主人是当时生活在辽西地区的其他部族。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表示,学术界对东大杖子遗址族属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说法,即山戎说、燕貊说、东胡说。在他看来,东大杖子这部分人是“燕戎遗存”,即接受了西周燕文

化强烈影响的山戎贵族。

王绵厚讲道,从地理位置看,东大杖子所在地是较为典型的“山戎文化区”,而与以老哈河为中心的“燕貊”相去甚远。从时代上看,到战国中期时,辽西之“貊地”早已相继为山戎、东胡所有。

再有,从东大杖子遗址所在的交通地理位置和时间看,存在两大要素:一是位于卢龙古道上。王绵厚认为,这条交通要道应该是燕王喜北逃和曹操征乌桓的必经之路,也应该是当年“秦开却胡”的必经之路,这与东大杖子遗址的时间上限相合。

二是东大杖子墓葬群显示,战国时期以后,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居民突然溃散,专家分析应与秦将李信于公元前222年伐燕入辽东有关,东大杖子原住居民被灭。由此可以推断,东大杖子遗址与公元前三世纪的“秦开却胡”,以及近百年的“李信灭燕”息息相关。

可以看出,作为燕国“北镇”戎胡的重要军事重镇,东大杖子一带兴于燕昭王的中兴,毁于燕王喜的末世,在辽宁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